

A stylized, abstract map of Asia in various shades of green, serving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book cover.

Media Security Theory

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

何镇飏 著

媒介安全论

大众传媒与非传统安全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Media Security Theory

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

何镇飏 著

媒介安全论

大众传媒与非传统安全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历史转折关头的明智选择

——《21 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序言

今天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形象,已昂然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让人刮目相看。世界惊奇发现,中国社会面貌光彩焕然,已非昔日可比,这似乎只是弹指一挥间。

回首过去,我们看到了辉煌的成就和灿烂的微笑,同时也看到了艰辛的汗水和坚实的脚步。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也与我们的时代同命运、共呼吸,演绎出激越曼妙的交响,我们既取得了累累硕果,也面临着重重挑战。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中国学者,我亲身体会感受到了这些年中国学界所走过的不凡历程,可以说是发展与困惑同在,成就与问题并存,我深深体会到祖国给予的坚强支撑,历史带来的巨大机会。

人至三十当是而立之年,而当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他的三十周年之际,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似乎再一次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困惑与选择之中”,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那么,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媒介与传播研究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呢?我认为,最明智选择应该是——

首先,要以历史为经,以现实为纬。当一门学科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先静下心来,反思和回顾已经走过的路。我们回顾和总结媒介研究的历史,并不是要沉溺于它、迁怒于它,而是要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教训、累积经验,为当下的媒介理论和媒介现实服务。换句话说,我们研究历史,要联系现实,而研究现实,也不要割断历史,继往开来,承前启后,才能使媒介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基。

其次,要以媒介为经,以社会为纬。新闻是社会的镜子,媒介是社会的大脑。研究媒介需要联系社会,研究社会需要指向媒介。媒介是这一学术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因此,研究媒介理论,需要以锐利的学科眼光加以审视和分析,也要用社会的尺度来丈量和称衡;要强调媒介理论思维与话语的主导性,也要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延伸和扩展。以媒介为经,可以确保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以社会为纬,可以落实其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媒介研究,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

第三,要以规律为经,以意义为纬。规律所在,科学所托。积极探索和揭示媒介规律,是媒介理论研究的基本宗旨和首要使命。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媒介理论研究不应该止步于探索和揭示媒介活动中内在矛盾诸方面的联系和斗争的客观法则和必然趋势,还应该突现和彰显这一过程的价值和意义,进而说服人们自觉遵循媒介规律,主动按媒介规律办事,从而进一步支配、制约和优化媒介活动的姿态、现状与趋势。规律、意义和行动共同构成了学术研究的金三角。

第四,要以中国为经,以世界为纬。中国是媒介理论研究的坐标点,而世界则是它的参照系。如果媒介理论研究不同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不在中国五千年民族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出来,不能指导具体的媒介活动,而只是简

单地贩卖、照搬和空谈西方媒介理论,那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甚至反对。但是,要推进媒介理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同国际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则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游戏规则,在坚持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基础上,使其具有世界元素和全球视野。

正是出于这种思考与选择,我们组织撰写和出版了这套《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这套丛书宛如一阁雅集,泛着书香,和着墨韵,透着笔力,跳着新意,凝着理性,闪着睿智,翻阅在手,会让人感到亲切可读,不忍释卷。这套丛书绝不泛泛而谈,更不人云亦云,而是深刻专注于一论,以一个特殊的视角来观照媒介万千世界的复杂性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如同透过一个视窗看到了万花筒的一次奇妙变换,或者像是随着一位导游进入一个秀丽壮美的旅游胜地,眼前美景让人不由地击节赞叹。

这套丛书中的每一种著作,还都坚持以理论与现实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选准研究的切入口,运用国际学术界最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最前沿的思想与观念,着力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路径和影响,以及如何科学、合理地解决问题,努力将问题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开掘。同时,丛书作者尽力不受媒介理论研究中传统范式和旧有成果的束缚,面向现实,立足交叉,追踪前沿,聚焦集成,努力把内、外两个学术世界的优点和精华收归己用,并积极探索适合课题对象和内容的研究模式、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

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毕业的博士生,寒窗苦读之后,学术成果斐然,如今他们当中,有的已是教授、副教授,有的已在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浙大读研期间,他们利用学校丰富的馆藏资料,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

一流的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媒介学等方面的专著、教材和论文,掌握了一整套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巧,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基础上,又积极申报省级以上课题并获得立项,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体系化,最终形成了已达预期目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专著。因此,这些成果和专著不仅符合上述要求,而且具有紧追前沿、观点新颖、内容创新、分析深刻、表述精当等特点,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这批浙江传播学人呕心之作的一次全面检阅。

我们深知任何学术研究,犹如探险,入之愈深,得之愈奇。我们庆幸的是,时代在感召着我们不断求索进步,我们所做的,只是承继了前辈脚步往前多迈了一步,仅仅是负起了这代学人应负的社会义务、历史责任,本不该有“探骊得珠”的奢望,但若这套丛书能为媒介理论研究和媒介运营实践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为中国媒介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建设稍尽绵薄之力,又能引起媒介学界和业界人士的一些关注和批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莫大的荣幸和鼓励了。

邵培仁

2011年9月于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1	引 言
6	第一章 安全的跨学科研究逻辑
6	第一节 传统安全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9	第二节 新安全：非传统安全的国际研究
12	第三节 哲学与政治学领域的安全研究
15	第四节 心理学视野的安全及其研究
18	第五节 社会学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
21	第二章 传播学视野下的非传统安全
	从拉斯韦尔到阿什德
21	第一节 从战争宣传到人的安全
25	第二节 传播带来安全：风险、危机与灾难中的大众传媒
28	第三节 反思与发展：传媒让我们更恐慌还是更安全？
36	第三章 媒介安全的分析及层次
37	第一节 媒介安全的主体是媒介
37	第二节 媒介安全与媒介恐慌
39	第三节 信息安全、产业安全与媒介生态
40	第四节 媒介安全的三个层次

43	第四章 恐怖主义及其袭击与大众传媒
44	第一节 恐怖主义利用大众传媒影响社会舆论
46	第二节 缺乏媒介安全的大众传媒助长了恐怖行为
48	第三节 大众传媒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51	第五章 自然灾害与生态安全中的大众传媒
52	第一节 自然灾害面前的大众传播
54	第二节 大众传媒的环保理念传播与生态安全
55	第三节 大众传媒在生态安全中的难点与成因分析
57	第四节 健康传播是相对成熟的媒介安全分支
59	第五节 能源安全与媒介安全
61	第六节 粮食安全与媒介安全
63	第七节 水安全与大众传播
66	第六章 金融危机、文化安全与媒介安全
66	第一节 金融危机与经济安全中的大众传媒
69	第二节 信息安全、文化安全与媒介安全
71	第三节 特殊群体安全与媒介安全
75	第四节 重大社会影响的犯罪行为与媒介安全
79	第七章 危机时代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
79	第一节 功能论的兴起与传播学发展
83	第二节 危机中的大众传播：安全功能的产生背景
85	第三节 大众传播传统功能中隐性化的安全功能

91	第四节	安全：四大传统功能之外的现代非传统功能
96	第五节	大众传媒安全功能的非传统安全特性
102	第八章	话语的安全和安全的话语 媒介安全的话语基础
102	第一节	来自哲学的安全话语：福柯的安全话语观
107	第二节	语言学：从批评性话语分析到媒介话语研究
114	第三节	哥本哈根学派：作为安全话语实践的媒介安全
116	第四节	传播学研究：作为安全的话语和媒介安全话语实践
121	第九章	消除媒介恐慌与失语的媒介安全模型
121	第一节	在恐慌与失语之间：媒介安全的模型分析
123	第二节	媒介恐慌：媒介夸大了现实风险
140	第三节	媒介失语：大众传媒在危机中的话语权丧失
146	第十章	中美媒介安全比较 基于国内和美国的大学生问卷调查
146	第一节	基于问卷调查的中美媒介安全
158	第二节	中美媒介安全偏向的文化成因考察
167	第十一章	国外媒介安全及其制度建设的发展与启示
167	第一节	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看美国的媒介安全及其启示
176	第二节	英国的媒介安全及其特点
184	第三节	日本的媒介安全及其特点

189	第十二章 我国媒介安全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189	第一节 我国媒介安全的现状与特征
195	第二节 我国媒介安全存在的问题
203	第三节 我国媒介安全的发展对策
214	结 论 大众传媒应让人类更安全
215	参考文献
241	后 记

引言

1941年1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向国会递交“租借法案”(Lend—Lease Bill)后的年度陈词结尾部分,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四项基本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其中免于恐惧的自由,出自这位喊出“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的美国总统,更有一番深意。免于恐惧的自由可以被视作罗斯福总统为二战时期的美国所制定的安全策略与政治纲领,并且一直延续到战后,直至成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Kennedy,1999)。从此之后,四项自由成为人类权力的共识。“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质就是“安全”,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项基本权利。

人类对社会化的安全的思索和追求由来已久。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典籍《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就提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这一观点辩证地论述了安全与危机的关系。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提及过相关的安全与国家的观点。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第一次论述了西方现代安全观(霍布斯,1986)。孟德斯鸠也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指出:“政治自由的关键在于人们要有安全,或是人们自己认为享有安全。”(孟德斯鸠,1961:188)

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的一批知名学者、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罗马俱乐部”名义下,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著名报告,率先提出了生态恶化可能导致的灾害,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思想,警示人类社会面临的某些非军事性灾难。这些报告和观点使过去不太引人注目的新安全威胁受到重视。在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速,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其中信息传播手段的改进和全球传播效率的提高,更使人类正常活动和国际社会正常交往的威胁变得日益严重,有些看上去甚至逼近失控的

边缘(王逸舟,2003)。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所言,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迫使人类逐渐走向越来越不安全的风险社会,其中时刻并到处充满着危机、恐慌与焦虑(贝克,2004:7)。

2001年“9·11”事件以后,随着新的国际关系和安全问题的不断出现,以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基础的传统安全已经难以应对当前的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引起了全球的高度重视。美国专门设立国土安全部(Home Security Bureau),加大了反恐怖主义的力度。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发挥了比国家政府更直接有效的、跨国的非传统安全作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十七大报告则再次重申了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地位:“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不突出的安全威胁,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人口爆炸、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行为主体和渊源更具多样性,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都不是国家行为直接造成的,而是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活动的结果。如恐怖主义就主要是由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制约了当代社会“免于恐惧的自由”。

大众传播由于其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易获得等特性,正在非传统安全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在“9·11”事件以后,随着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环境污染、地区冲突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非传统安全事件在21世纪更加频繁地爆发,人们开始重视大众传播媒体在这些非传统安全危机中所发挥的安全作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专门成立了媒介安全委员会,其主旨就是发挥大众传媒在灾难、战争、恐怖袭击或其他紧急状态下维护人类安全的功能,同时还要求全美的大众传媒在非传统安全的危机时

刻,按照 FCC 的统一要求和执行手册,最大范围地为各类人群提供安全信息和服务(何镇飏,2009)。最近几年,我国也频繁遇到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各类灾害和危机,特别是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舟曲泥石流、2008 年雪灾等自然灾害,SARS、甲型 H1N1、禽流感、口蹄疫等健康危机,三聚氰胺、苏丹红等食品安全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媒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及时有效地传递了信息,避免了公众的恐慌,增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全感。

2008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重要讲话中指出,给前线救灾的部队每人配发一台收音机。4 天内,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向一线部队配发 17 万台无线电收音机。因为在通讯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的灾区,只有无线电收音机能迅速、及时地把各种信息传播给高度分散的、地处各个偏僻村庄的各支救灾部队,从而实现信息的及时准确接收(孙健 李天娇,2008)。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众传媒救灾抗灾、保障安定的经验积累与现实印证。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来看,大众传媒不论是在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军事行动中,还是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或者 SARS、雪灾、强热带风暴等公共危机事件中,都发挥了维护稳定、透明信息、制止恐慌的媒介安全功能,成为保障国家平安定、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何镇飏,2009)。本研究认为,关注非传统安全,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与危机,已经成为我国处在转型期的重要议题,无论是从国际大环境还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我们都应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针对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发挥我国大众传媒在非传统安全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媒介安全战略和体系,实现媒介安全在我国的制度化建设。

然而,国内外对于大众传媒在非传统安全中的作用却鲜有系统研究,究其原因是研究非传统安全的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对大众传播研究有限,而传播学者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也才刚刚开始。安全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课题之一,非传统安全是传统的安全问题在新时期的形态,本书从传播学角度论述大众传媒何以并如何实现非传统安全,是为“媒介安全论”。实践证明,非传统安全的实施和大众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关于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还从来没有被学术论证过,这项正在不断被应用的传播手段值得并且需要进行以传播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理论论证。通过本研究,可以论证大众传播

的现代功能——安全,证实大众传媒能够通过有效传播信息,营造和建构非传统安全。

媒介能够在人们头脑中营造一个虚拟世界(李普曼,2006)。而这个虚拟世界会通过新闻等话语建构的手法,为受众营造一个“感知世界”,在这个感知世界里,安全或恐慌主要来自大众传媒的影响。公众会以为他们通过大众传媒感受到的就是“现实”的危险或安全。大众传媒可以因此增强受众的“安全感”,也可以引起公众恐慌。如何在当下这个充斥风险与危机的时代,发挥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就成为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本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

第一,传播学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应该怎样系统梳理,其研究脉络如何,涉及的学者和研究成果有哪些?

第二,大众传媒是否具有安全功能,安全功能和传统四大功能(监测、协调、教育、娱乐)的关系如何?

第三,什么是媒介安全,其核心要素有哪些?这些要素是如何影响媒介安全的?

第四,大众传媒为何能够实现非传统安全?其重点与难点在哪里?

第五,如何实现媒介安全?需要借鉴国内外哪些先进经验?需要采取怎样的路径和方法?如何进行媒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本研究相关理论包括:传播学关于大众传播与安全的理论、批判性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框架理论、新安全学与非传统安全、后现代主义等。拉斯韦尔提出过大众传播的功能,包括:(1)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2)联系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对环境作出反应;(3)社会遗产的代际传播(Lasswell, 1948)。拉斯韦尔指出:“我们对研究传播行为与整体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联更有兴趣,而非细分传播行为本身。任何过程都可以放到两个参考框架中加以分析,这就是‘结构’和‘功能’。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传播的某些特定功能。”(巴雷特,2004: 112)。赖特于1974年发表了《功能分析和大众传播研究回顾》,他指出要重视传播的功能分析,提出了第四大功能“娱乐”。而此后35年,关于大众传播的功能几乎没有新的理论诞生,传播学者也习惯了“四大”功能说,但根据拉斯韦尔和赖特(包括卡茨)等人的观点,传播的某些特定功能是可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被不断发掘的。

通过媒介社会整合论的视角,麦奎尔认为“功能的整合(没有冲突,为了共同的任务进行合作)和规范的整合(具有共同的规范和价值)”两者和传媒都有关系。考量非传统安全中对于“认同”的核心理念的研究,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找到又一个结合点,“大众传媒的特殊作用就是向社会提供一种凝聚力、一种经验的综合,以及一种整体意识”(麦奎尔,2006)。而对共同的价值观的认同就是非传统安全的基础,“安全是一种主体间的‘认同’”(余潇枫,潘一禾,王江丽,2006:345)。

本研究运用了如下研究方法。

混合研究法 通过对文献的搜集、整理,论证相关议题。本研究将围绕媒介安全微观把关人与中观把关人,对媒介从业人员中的编辑、记者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当事人对传媒中观、微观媒介安全制度与国家宏观媒介安全政策和环境的看法及态度。

口述史研究法 口述研究通常用于弱势群体,或人数很少的某种特定历史的考察。在本研究中,主要用于对弱势群体(残疾人)的媒介依存度研究,以求制定合理的针对残疾人的媒介安全策略与政策。

政策德菲法 在针对媒介安全立法的量化统计的基础上,运用德菲法对不同意见进行整理和研究,作为量化方法的补充。

个案研究法 着重考察国内外非传统安全事件中的媒介表现,特别是媒介安全功能的发挥。通过个案进行深入调研与考察,归纳总结出共性的媒介安全特征。

话语与内容研究法 以质化的话语研究方法为主,结合少量量化研究和内容研究,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论证“安全是一种话语”。

本研究的量化研究并不多,但都是要点、难点,主要选择了以下三个角度:一是从文献角度对相关论题进行量化研究;二是针对特殊群体的媒介安全进行量化研究,在第十章中对中美两国在校本科大学生已经开展的问卷调查,他们如何通过大众传媒及时、有效获得安全信息,特别是在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公共安全事件中;三是针对媒介安全会影响到个体的自由以及制造恐慌,对于这个问题将进行专题问卷调查,以确定公众对于大众传媒传递安全信息的态度。

第一章

安全的跨学科研究逻辑

第一节 传统安全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安全问题与人类社会的诞生与发展相伴随。在汉语构字法上,“安”是屋檐下之女,意即受到保护的意思,或者说保护弱小的女子,也表达了安稳是人类生存之母、生存之基;“全”是“人”字下一个“王”字,意即人之最大、最高、最基本、最完全的需求。《现代汉语词典》指出,安全即“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①。安全是与危险、威胁、恐怖、恐慌相对应的概念。有的学者认为,“安全”就其内涵而言,“指的是事物生存免受威胁或危险的状态”(陆忠伟,2003)。安全的梵文为 sarva,意即无伤害或完整无损。安全的英文词条通常为 safety 或 security,前者着重于物态的安全,后者注重于人文、社会的安全,例如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等。

从词源上讲,“安全”就是“拥有信任、保险和(客观)确定性的基础,”(Bill McSweeney, 1999)孟德斯鸠将安全理解为关于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存在于安全之中”。亚当·斯密认为,“自由和个人的安全”是“免于对个人和个人财产遭受暴力侵袭的境界”(Emma Rothschild, 1995)。从这些词源来看,安全就成了与自由秩序和社会一致等价值观相重叠的人的价值。在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版,第7页。

当代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虽然对安全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安全”概念的实质性内涵至少已经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安全意为消除威胁”(郑先武,2009)。这个共识包括了两方面的含义和基本条件:一是没有对原有已承认的价值观构成威胁;二是如果这样的威胁存在,有能力以合理的代价保护自身免于该种威胁,即获取安全。安全其核心是围绕威胁的根源(即造成不安全的原因)、威胁的本质(不安全和安全的领域)、威胁的对象(安全指涉对象、威胁的消除,包括消除威胁的施动者即安全行为主体)和基本手段(即安全的途径)等四个核心问题展开。

政治学对安全的研究由来已久。在封建时代,安全主要指王权的维系。《君王论》中马基雅维利探讨了安全问题,指出:“一位君主最好是既被人畏惧又被人爱戴。不过既然两者兼备是很难的,当两者之一必然有所欠缺时,被人畏惧要比被人爱戴更加安全。”(马基雅维利,1996)马基雅维利的观点非常明确,是否爱戴君王的主动权在人民手中,而是否让人民恐惧的主动权却在君王手中,对于君王而言,应该掌控他所能掌控的(被人畏惧),而不是去掌控他所不能掌控的(被人爱戴),因此马基雅维利得出结论:君王“被人畏惧要比被人爱戴更加安全”。值得注意的是,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恐惧可以被用来进行政治统治。这一发现不仅导致了历史上各类统治阶级运用恐惧来掌控人民,如阿尔巴尼亚官方运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慌来统治国内民众;希特勒利用“劣等种族”的威胁来发动保卫“雅利安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布什政府利用美国民众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惧,发动了“反恐战争”并推翻萨达姆政权。虽然布什政府通过宣布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解除了美国民众的恐慌,但是利用恐惧实现政治目的的意图已经达到。恐怖分子无法实现被人爱戴,但是却可以用非常手段实现被人畏惧,从而使其政治主张得以广泛传播,并提升恐怖组织及其政治观点的“安全感”。如果统治阶级和恐怖分子利用大众传媒来制造恐惧感,那么效果将更快、更直接、更有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媒介安全是一个长期而重要的命题。

第一本将安全、恐慌(恐惧)与国家结合起来的政治学著作是17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和马基雅维利相反,或者说延伸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霍布斯认为,实现公众的安全即免于恐惧,才是政治的重要任务。霍布斯在《利维坦》第十章中指出:“人们希望安